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 文 与 社 会 译 丛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自由史论

John Acton

[英国] 约翰·阿克顿 著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 等译

刘 东·主 编 彭 刚·副 主 编



译 林 出 版 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自由史论

John Acton

[英国] 约翰·阿克顿 著 胡传胜 陈刚 李滨 胡发贵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史论 / (英) 阿克顿 (Acton, J.) 著; 胡传胜等译. —2
版 (修订本).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6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berty
ISBN 978-7-5447-2590-3

I. ①自… II. ①阿… ②费… III. ①自由-研究-英国-近
代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3764 号

书 名 自由史论
作 者 [英国] 约翰·阿克顿
译 者 胡传胜 陈 刚 李 滨 胡发贵
张 华 朱 珊 蒋海怒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Liberty Classics, Indianapolis, 198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471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590-3
定 价 5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前言	001
----	-----

第一部分 自由史

一 古代自由史	011
二 基督教自由史	033
三 欧洲民主政治史	056

第二部分 英美的自由传统

四 清教革命	089
五 辉格党的兴起	098
六 英国革命	108
七 汉诺威嗣位	119
八 论英吉利共和国	130

九 论柏克	134
十 对18世纪观念的反叛	141
十一 违反自由精神的自由主义	147
十二 麦考莱与辉格党理论的两个传统	151
十三 利物浦伯爵的平庸	155
十四 女王《日志》	157
十五 妥协是政治的灵魂	161
十六 殖民地	178
十七 美国革命	190
十八 美国的影响	198
十九 论汉密尔顿	213
二十 美国革命的政治原因	216
二十一 美国内战的历史地位	260
二十二 美国内战记	275
二十三 阿克顿—李将军通信	348
二十四 奴隶制与自由	354
二十五 分离运动作为英国自由主义的阶段	358
二十六 内战史评论	360
二十七 美国的媒体、大学与国会	363
二十八 美国英语	374
二十九 公正对待保守主义	380

第三部分 自由与现代民族国家

三十 民族性	395
三十一 加富尔	420
三十二 意大利的宪政精神	447
三十三 普鲁士改革与日耳曼政治传统	455
三十四 从保守的自由主义观点看	465
三十五 官僚主义与两种政治思维	500
索引	514
后记	578

前言

xi

约翰·埃默里齐·爱德华·道伯格—阿克顿1834年2月10日生于那不勒斯。^①在他的父亲费迪南·理查德先生1837年去世后,他继任第八世准男爵,并继承了在什罗普郡奥登海姆的家产。1869年由于自由党首相威廉·爱华特·格拉斯顿的推荐他被擢升为贵族,成为奥登海姆的阿克顿男爵。

在慕尼黑大学学习(1850—1857)之后,阿克顿回到英国,担任自由

① 阿克顿传记中,格特鲁德·希姆法伯的《阿克顿勋爵:良心与政治的研究》(芝加哥,1952)仍属上乘之作。希姆法伯广泛运用了已于1903年捐献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阿克顿的文章和笔记。大卫·马修的《阿克顿勋爵及其时代》(伦敦,1968)对阿克顿生活年代的人物与事件的介绍重于对他本人的生平与思想的介绍。赫伯特·舒廷格尔的《阿克顿勋爵:自由的历史》(伊利诺斯,1976)是对阿克顿具有同情的记述,采用了近期的学术成果。约翰·肯扬的《史家: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历史学科》(伦敦,1983)第125—143页,是最近的讨论,也是对阿克顿带有批评性的讨论,但其中也暴露出肯扬缺少阿克顿著作的第一手资料。

自从希姆法伯著作出版以来,因为阿克顿与德林格、辛普森的通信集的出版,我们关于阿克顿的知识增进了许多。此外,希姆法伯所使用过的阿克顿在剑桥的文稿包含他的第一手研究笔记。1973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一大箱阿克顿的通信和文稿。因此,我们需要一部充分利用这些新资料的阿克顿传记的出版。

xii 天主教的发言人。^①作为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和政治上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相信促进个人自由、政治上的自治和不受约束的科学探索原则是天主教的真正性质和使命。阿克顿认为,通过这些原则的成功实施,正义的事业、天主教信仰和教会自身的利益将会得到保证。为献身于这些理想,阿克顿成为两个时间不长但却很出色的期刊《漫游者》和《国内外评论》的合编者与投资者。他为之写了很多随笔、书评和有关时事的文章。在《国内外评论》于1864年停刊之后,阿克顿为《纪事》(1867—1868)和《北不列颠评论》(1869—1871)写随笔和评论。^②他对这四个期刊的贡献不仅包括关于当代天主教问题的随笔,而且还有对当前的观念和事件,如对欧洲大陆上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美国内战的历史研究与政治上的分析探讨。然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自由及其赖以得到保障的手段。除这些新闻活动以外,从1859年至1865年他还在下院有一个短暂的自由党议员时期。^③

对阿克顿说来,教皇永无谬误论是对历史真实和政治自由主义所有准则的一种践踏。他相信,天主教成为一种进步和自由力量的所有希

① 阿克顿在自由天主教运动中的作用是《阿克顿选集》第3卷的内容。这方面详尽的学术研究包括约瑟夫·阿索尔兹的《英国的自由天主教运动:〈漫游者〉及其1848—1864年的作者群》(伦敦,1962)以及休·麦克杜戈尔:《阿克顿—纽曼关系:基督教自由主义的困境》(纽约,1962)。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天主教的一般情况,见爱德华·诺曼的《19世纪英国天主教教会》(牛津,1984)。

② 有关这些期刊历史的较详细讨论,见阿索尔兹和麦克杜戈尔的著作,也见下面两项成果:欧根·克拉克:《天主教自由主义与教皇绝对主义》(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5)以及盖尔·鲁恩的《1864—1871年阿克顿圈子:〈纪事〉和〈北不列颠评论〉》(诺特丹大学学位论文,1969)。

③ 阿克顿的议员生涯是詹姆斯·奥克乌莫迪的系列论文的主题:《作为下院议员的阿克顿》,《亚历山大里亚大学人文学报》,第5卷(1950);《阿克顿当选爱尔兰议员》,《英国历史评论》,第61卷(1946),第394—405页;《阿克顿:年轻的议会活动家》,《澳洲与新西兰历史研究》,第9卷(1960),第131—139页。

望，被教皇是人类宗教和道德良心的不会犯错误的仲裁者这样一种教义所损害。他在反对1869—1870年梵蒂冈大公会议颁布教皇永无谬误论的活动中发挥了最直接和最积极的领导作用。^①随着他的失败和自由天主教运动影响的丧失，他人生的这个阶段也告结束。他仍然留在教会；但他在天主教的知识界不再起什么作用，也不常写东西发表。他代之以从事个人的历史研究，在英国，在里维埃拉，以及在巴伐利亚的泰格斯别墅过着富有的上流社会的家庭生活。他与格拉斯顿保持一种密切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关系，他对这位首相的影响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可以见到，如格拉斯顿对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以及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②作为女王侍臣，他深受维多利亚女王喜欢，他的学识，他道德上的正直以及社交时的典雅风度使他成为维多利亚英国知识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xiii

1870年以后他的文字活动已很少。他1877年关于“古代自由史”和“基督教自由史”的演讲可视为范围更为广泛的《自由史》的起源。这一著作始终停留在研究和计划的阶段；但阿克顿在此阶段和其他的研究中收集的大量材料仍可表明其历史学识和思想的深度与广度。阿克顿是1886年的《英国历史评论》的创建者之一。在1886年至1895年他给此杂志提供了两篇长文和八篇评论文章。在这样厚实的历史学贡献基础

① 阿克顿和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关系在《阿克顿选集》第3卷中讨论。这方面的一手材料和解释性论文收集在戴米安·麦克尔拉特的《阿克顿勋爵的决定性年代：1864—1874年》（卢汶，1970）。阿克顿这个时期的日记已由爱德蒙·坎佩翁编辑出版，题为《阿克顿与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日志》（悉尼，1975）。除了这本资料集和麦克杜戈尔、鲁恩的著作以外，还有维克多·康齐米乌斯的《阿克顿勋爵和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教会史杂志》，第20卷（1969），第267—294页。

② 阿克顿与格拉斯顿的关系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见威廉·W. 怀特：《阿克顿与格拉斯顿：他们的友谊与相互影响》（美国天主教大学学位论文，1973），以及欧文·查德威克的《阿克顿与格拉斯顿：1975年克赖顿历史讲座》（伦敦，1976）。

xiv 上以及由于他已具有“在世最有学识的英国人”之名望,阿克顿1895年被任命为剑桥皇家教授。^①他的人格,他的演讲,他作为《剑桥现代史》的组织者和主编的角色对英国的历史研究都发挥了直接的和有益的作用。在1902年6月19日他去世后,他的有七万本藏书的图书馆,连同他毕生收集的研究资料都通过剑桥图书馆献给了历史研究。他的学生费格斯和劳伦斯出版了他的剑桥演讲《法国大革命讲稿》和《现代史讲稿》,两卷论文选集,一卷信件。他的头衔被他的儿子理查德·马克西姆·道伯格—阿克顿,即第二世阿克顿男爵所继承。

阿克顿的生平事迹可以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但它们对使他成为维多利亚知识界最出色和最难以把握的人物之一的复杂维度,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

首先是贵族维度。阿克顿是什罗普郡一个有着很长谱系的准男爵的后裔。作为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好几代人均在大陆上获得事业上的成功。阿克顿的祖父约翰·阿克顿先生升至那不勒斯波旁王国的首相,阿克顿的父亲费迪南第六,即费迪南·理查德先生,与德·道伯格公爵的女儿和继承人玛丽·比宁·德·道伯格结婚。因此她属于最著名的英国贵族家庭。当阿克顿的父亲去世时,她再嫁而进入强大的英国辉格党贵族的政治社交领域。她的第二位丈夫,即阿克顿的继父,是上院的自由党领袖格兰维尔伯爵。格兰维尔伯爵是格拉斯顿亲密的政治盟友,并三度加入他的内阁。阿克顿的妻子也出生于一个在巴伐利亚和意大利都很有名的家庭。

这样的出身和家庭关系使阿克顿能过着一种有特权的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身处欧洲大陆和英国社会最为珍稀的阶层之中。在晚年他也确实感到手头较紧,但从未迫使他把手头活动变成挣钱的工具。这使他

① 关于阿克顿学识的引文出自曼德尔·克赖顿(《英国历史评论》的首任主编);路易·克赖顿:《曼德尔·克赖顿的生平与通信》(伦敦,1913),第1卷,第275页。

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最初的那些文人，也有别于现代的学院派历史学家。阿克顿很有运气。他从未得到一个正式学位，但被授予慕尼黑、牛津和剑桥的荣誉学位。他没有按部就班的学术经历，但他第一个和唯一的职位是历史教授职位，是联合王国两个最著名的历史教授职位之一。

然而，阿克顿并不是一个贵族式的半瓶醋。他是一个科学的历史学家，其职业素养远过于英国其他可与之相比的同代人。^①或许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阿克顿年轻时未被允许进入牛津和剑桥的学院。他被送去慕尼黑大学，在那里受教于天主教会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伊格纳兹·冯·德林格。在阿克顿的生涯中，没有什么比伊格纳兹·冯·德林格的影响更为重要。德林格对这位十六岁的英国准男爵承担了父亲的角色。阿克顿住在德林格的家里，陪他旅行，去欧洲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学者那里。19世纪的德国正是历史研究的前沿，德林格则身处一流德国历史学家之列。从德林格那里，阿克顿学会了把历史看做科学，而不是艺术。历史学家的职责只有一个：通过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以及对之进行客观评价来追求真理。在对档案材料重要性和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根据原始文献研究的理解上，他从根本上超越了德林格。说担任剑桥皇家教授的阿克顿置身于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列是相当公正的。他是一位19世纪的方法论大师，而他对于心智史重要性的重视预示了20世纪前半期历史学发展的潜在趋势。

xv

从德林格那里阿克顿还学会了历史地思考——视历史为理解现实的工具。以德林格为榜样，阿克顿在历史中找到了在两个指导他毕生的原则——自由主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实现和解的工具。

在自由一词的经典意义上，阿克顿是个自由主义者。他相信“自由不是为了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并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对公民社会和私

①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阿克顿是《阿克顿选集》第2卷的主题。

人生活的最高目标提供保证。”^①他认为在超出自身利益的必要界限时，政府进行干预只能是在推进保证和促进个人自由的限度内。

xvi 针对英国圣公会仰慕者的疑惑，阿克顿认为，他对自由的忠诚和作为一名罗马天主教徒的信仰之间并无矛盾。在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他对基督教教义的信仰都是不容置疑的。他相信基督教的启示是自由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个人的价值无可估量，其恩赐的自由超过希腊或罗马所拥有的一切。他以直觉视教会为促进自由的重要的潜在力量。只有教会拥有一个能抵抗现代政府及其绝对化趋势的组织。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抑制和平衡，教会能够为个人自由提供广泛的保证。因为阿克顿相信这些，所以他感到，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成果和绝对主义教义的公告就是背叛。

阿克顿认为，教皇永无谬误论像所有绝对主义法令一样不仅是不明智的，是个错误，而且是不道德的。阿克顿心目中的道德尺度与他关于自由、历史和宗教的所有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阿克顿提及道德时总是涉及自由和宗教。自由给人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的机会。真正的宗教能使人的良心和知识升华，以至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自己分内的事时都应当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能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分善与恶的界限。在其福祉的必要限度之外，它只能促进那些能够成功抵抗诱惑的因素——宗教、教育和财富分配，来间接地帮助生存斗争。”^②

阿克顿不相信道德能与政治或公众生活相分离。为爱国主义理由下命令谋杀的政治家与为金钱拦路抢劫杀人者同样都是谋杀犯。阿克顿认为，用同样的标准对之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阿克顿主张

① 参见以下第22页（此为原书页码，见中文本边码，以下皆同。——编者注）。

② 见以下第7页。

历史有一个道德目的；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对所描述的事实和对人物作出判断。他赞同埃德蒙·柏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①

阿克顿自己的一生道德色彩也同样强烈。他是少数仅通过研究其私人文献就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人物之一。他的研究笔记、一生所收集的资料以及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件，给了我们一副阿克顿的肖像，其才智和性格并非他的公开出版物所能包含。通过那些熟悉他的人们，我们能最清楚地了解其才智和性格。剑桥学监和天主教主教都感受到和谈到一个拥有“所有美德而无缺点”^②者的个人魅力和道德上的正直。格拉斯顿信任他“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约翰·莫利称他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③。知识分子和那些在权力走廊漫步的人仰慕这位学富五车、胸襟开阔的人，他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并能在半个小时之内讲出一本书的微言大义。

然而那些最仰慕他的人也感到有一种失败感在主宰着阿克顿。在一则笔记中他对自己说，他的一生荒废了。^④这样一种失败了使命感和荒废感，我们可以从本书卷首的肖像中那双注视着我们的眼睛中看出。

年轻时他就寻求把他的学识贡献给天主教事业。他的目标是教育

① 至于柏克和这段语录请参见阿克顿在剑桥的就职演说，《历史研究》（伦敦，1895），第63，73页。该演讲见《阿克顿选集》，第2卷。

② 该引言来自奥撒·希朗的《晚年的回忆》（伦敦，1923），第15页。

③ 格拉斯顿的观点包含在阿克顿写给他的女儿玛莉·伊丽莎白·安妮的一封信中，此外见手稿8121号第22栏。莫利的论文见他的《回忆录》（纽约，1917），第1卷，第229—235页。赫伯特·鲍的《阿克顿勋爵致玛莉·格拉斯顿信件》中“引言”（纽约，1904）第9—91页提供了阿克顿对那些熟悉其个人者影响的生动说明。

④ 另见手稿540号，第19页。

基督徒懂得“教会在政治方面以及在科学方面都不追求自己的目的。如果它鼓励追求科学的目的,即真理,追求国家的目的,即自由,那么她将会达到。”^①梵蒂冈大公会议终止了这一使命。当他认识到,即使是他的良师和密友德林格对他关于历史的道德判断也不能够理解,更不用说同情时,他只得放弃对《自由史》的构思。当阿克顿在他关于乔治·艾略特的文章以及对曼德尔·克赖顿的《宗教改革时期的教皇世系史》的评论中提出关于道德以及一位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之思想时,他的仰慕者也对之感到困惑。没有人真正懂得他的思想,这样一种感觉起了很大作用,促使阿克顿不愿开始动笔撰写他的《自由史》。因为他对他的最热心仰慕者之一、首相的女儿玛莉·格拉斯顿表白过:“我既没有信徒也没有同情者,因为他们从不给我鼓励和信任。”

对于他没有发表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说,阿克顿的学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是在他已出版的随笔、演讲和评论中,在他的通信和未出版的笔记中,他留下了非常重要和具有创造性的知识遗产。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格特鲁德·希姆法伯,英国的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以及德国的乌里奇·诺安克在利用这笔遗产时发现了这样一个阿克顿,他的话对于亲见了欧洲物质的和道德的腐败,以及法西斯主义政体伪装下的国家专制主义之胜利的一代人,具有先知般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阿克顿仍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令人信服地直接与我们说话。他对人性和政治的本性,对人类自由的意义,对那些促进和威胁人类自由的力量之深刻洞见,比一个多世纪前他撰写它们时更为真切。他的启示对民主社会中每一位善于思考的公民都至关重要。让阿克顿再次以自己的语言对我们这代人说话,这正是编本选集的目的。

J.鲁弗斯·费尔斯

1984年6月

^① 《阿克顿—辛普森》,第2部分,第195页。

第一部分

自由史